

第三節、渝方的和談謀略

民國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間是汪精衛組織政府緊鑼密鼓之時期，爲了阻止汪精衛組織政府，重慶曾給地下工作人員很多指示，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國民政府的華北黨政軍聯合辦事處曾電當時中央黨部秘書長兼「中統局」局長朱家驊¹，該電稱汪精衛正派人至北方活動，汪預計於七月附日，該辦事處已派人打入汪系活動，準備破壞²。八月三十一日，朱家驊再電上海特別市黨部主委吳紹澍及委員吳任滄等，朱要市黨部人員對汪精衛召開之國民黨「六全大會」及參加份子，力爲設法徹底破壞，嚴行制裁，至少亦予以重大打擊³。九月十一日，朱家驊再電吳紹澍稱汪精衛的中央政府即將成立，對內及對外都將造成重大傷害，朱要其力爲設法破壞、集中力量制裁⁴。十一月六日朱再電上海，稱日本竭全力進行所謂偽中央政權，意圖造成既成事實，俾利其與美英俄之談判，以亂國際聽聞，動搖國內人心，朱希望上海市黨部人員加緊破壞之，甚至對汪制裁，朱保證負責籌措經費⁵，可見重慶對於汪精衛之組織中央政府是非常擔心的。

重慶除了要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員盡力破壞甚至制裁汪精衛之外，還曾利用與日本和談的機會，設法破壞日汪間的合作，達到了延緩汪政權成立及阻撓日本對汪政權的承認的作用。這樣出於謀略的和談，至少有兩次是由「軍統」及「中統」所主導完成，其中一次是民國二十八年下半年及二十九年，「軍統」香港區人員曾政忠、劉方雄、張治平等人秉承戴笠之命與日方萱野長知及今井武夫、臼井茂樹等人的和談，另一次則是被日方所捕的上海市黨部執委姜豪，也秉承戴笠及朱家驊之命於二十八年底在香港與日方人員今井武夫等人和談。

由於軍統香港區及上海市黨部姜豪與日方的和談都帶有延緩汪政權成立的目的，所以一定程度上也在重慶與汪精衛的地下鬥爭中發揮了作用。不管雙方是否出於真意要和談，重慶的這兩場和談謀略發揮了一定作用。

一、將計就計、姜豪路線

抗日戰爭前姜豪原擔任上海市黨部監察委員，日軍攻佔上海後，民國二十七

¹ 朱家驊於民國二十七年四月開始擔任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兼「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調查統計局」局長，民國二十八年冬調任組織部部長。見朱傳譽主編，《朱驍先傳記資料》，(台北:天一出版社，民國 68 年 11 月)，頁 3。

² 〈華北黨政軍聯合辦事處電朱家驊—民國 28 年 6 月 26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驊檔案》，第八十三函:滬市制裁(制裁漢奸)。

³ 〈朱家驊電吳任滄吳紹澍—民國 28 年 8 月 31 日〉《朱家驊檔案》，第八十三函:滬市制裁(制裁漢奸)。

⁴ 〈朱家驊電吳開先吳紹澍—民國 28 年 9 月 11 日〉《朱家驊檔案》，第八十三函:滬市制裁(制裁漢奸)。

⁵ 〈朱家驊電吳紹澍—民國 28 年 10 月 6 日〉《朱家驊檔案》，第八十三函:滬市制裁(制裁漢奸)。

年一月國民黨於上海設立地下的市黨部，姜豪為五個執行委員之一，當時主任為童行白，蔡洪田為書記長⁶。民國二十七年十月，日人小野寺奉其參謀本部之命抵達上海，為指導對華作戰提供參考，小野寺至上海後即開設「小野寺辦事處」，辦事處中的首要人物為吉田東祐，十二月，日本大本營陸軍省授權小野寺同國民政府和談⁷。當時日人扶助之「維新政府」督學楊鵬搏及朱泰耀向姜豪提供了日軍和「維新政府」的情報，楊鵬搏原為留日學生，透過楊之介紹，姜豪認識了吉田東祐，楊擔任吉田東祐之秘書⁸。日本軍部有一派人認為汪精衛無作用，然影佐禎昭的「汪精衛工作」進展順利，為此小野寺急於尋找重慶方面的人。朱泰耀建議姜豪與小野見面，姜豪電重慶朱家驊請示，但未得答覆，沒有見成⁹。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姜豪曾回到重慶參加國民黨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一期受訓，三個星期後的五月姜豪回到上海，五月九日中午姜豪在公共租界福來咖哩飯店被日本便衣憲兵綁架¹⁰，被架上汽車後的姜豪被送至四川北路中國銀行大樓的日本金谷憲兵隊，一週後朱泰耀、楊鵬搏及吉田東祐營救出姜豪，吉田帶姜豪去見小野寺¹¹。

小野寺告訴姜豪，日本政府之元老、財閥和一部份軍人主張中日之糾紛和平解決，並稱目前是中日進行和談之時機，若重慶願和日本和談則日方可以放棄汪精衛。最後小野寺將姜豪送至法租界去尋覓國民黨在上海的負責人，十幾天後吉田東祐不斷催促姜豪，姜豪告訴吉田國民黨上海負責人躲起來了，唯有至香港才可能找到線索。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姜豪夥同楊鵬搏、朱泰耀及吉田東祐赴香港，姜豪在香港見到國民黨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及原上海市長俞鴻鈞，港澳特派員吳鐵城，他們都要姜豪回到重慶向政府匯報請示，七月姜豪回到重慶並向朱家驊做

⁶ 姜豪，〈我向日方探和經過〉，收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總第33輯，頁119。

⁷ 沈飛德，〈一次流產的秘密和談—姜豪先生談姜豪路線始末〉，《檔案與史學》，1995年，第2期，頁65。

⁸ 姜豪，〈我向日方探和經過〉，收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總第33輯，頁119。

⁹ 沈飛德，〈一次流產的秘密和談—姜豪先生談姜豪路線始末〉，《檔案與史學》，1995年，第2期，頁65。

¹⁰ 「市委姜豪同志及職員吳雨縈等五人今午在英租界被日人綁去，情節離奇，顯有內線，正偵察及設法營救」見〈吳紹澍電朱家驊—民國28年5月9日〉《朱家驊檔案》，第六十一函：京滬陷害。該電為姜豪被捕吳紹澍電知朱家驊。

¹¹ 事實上姜豪與吉田的聯絡極可能是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主委吳紹澍所授意。周佛海於民國33年10月12日日記中曾提到：「接見李贊侯、吉田東祐及向井三人，分別各談半小時，吉田與吳紹澍有聯絡，但恐亦係謀略關係，非內地以次為和平線索也。」可見吉田與吳紹澍的關係。見蔡德金編著，《周佛海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1089。

了匯報，朱一時未做表示並請姜豪等待安排工作¹²。

等了三個月一直沒得到朱家驊安排工作的消息，原來朱家驊正與「軍統局」副局長戴笠在討論著是否將計就計，派姜豪至香港與日方遂行「和談謀略」。九月五日戴笠曾函朱家驊，對於由軍統指揮派姜豪赴香港活動一事，因歐洲情勢變化及日本內閣變動，故需再觀察幾天才能決定¹³。九月二十七日戴笠告訴朱家驊，擬派姜豪赴香港偵察日本意圖以及汪精衛一夥人的活動¹⁴。在取得蔣中正的許可下，戴笠在重慶曾家岩軍統辦事處會見姜豪兩次，戴笠要姜豪至香港聽聽吉田東祐講些什麼，隨時向他匯報，但不能講國民政府有什麼意見。見了戴笠後姜又見朱家驊，朱要姜也要將會談情形隨時匯報，並給姜一本密碼本，請姜屆時將電報翻成密碼後由「港澳特派員」吳鐵城轉發。姜豪此行主要任務在分化汪精衛內部意見，阻止汪精衛組織政府¹⁵。十一月姜豪到了香港，軍統香港區人員劉方雄來找，劉稱以後由其負責聯絡¹⁶，此後姜豪與日人的會談都由劉方雄及吳鐵城分別轉電戴笠與朱家驊¹⁷。

二、要蔣下野、會談觸礁

本來日本方面「小野寺機關」的姜豪路線遭到「梅機關」影佐等人的反對¹⁸，小野寺已經關閉該機關回到日本，但「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的總參謀坂垣征四郎及其屬下今井武夫卻仍支持該活動，於是今井先派香港領事鈴木卓爾與姜豪見了兩次面，鈴木要求姜豪出示代表重慶政府的文件，姜稱其只是個人行動不能代表重慶，於是會談無結果，十天後吉田東祐奉今井之命至香港，姜豪乃與吉田東祐、朱泰耀及楊鵬博在澳門展開會談，姜豪出示朱家驊的信及有蔣中正本人蓋章的蔣照片以取得信任，十一月十四日姜豪將會談結果電朱家驊，該電內容：

坂垣已派高山來晤，藉悉敵方現決全力扶植汪逆，但亦知偽中央成立後

¹² 姜豪，〈我向日方探和經過〉，收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總第33輯，頁122。

¹³ 〈戴笠函朱家驊—民國28年9月5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驊檔案》，第四九七函：姜豪、姜琦、姜夢麟、姜壽春、姜立夫、姜卿雲、姜亮夫、姜斌、姜又安。以下有關姜豪之電報皆出此函，不再贅引出處。

¹⁴ 〈戴笠函朱家驊—民國28年9月27日〉《朱家驊檔案》。

¹⁵ 姜豪於後來朱家驊命其停止工作後曾電朱稱：「職工作原意本在分化對逆內部意見與阻止汪逆組府，二月來尚見成效」〈姜豪香港電朱家驊—民國28年12月6日發電〉《朱家驊檔案》。

¹⁶ 民國二十七年至三十年間劉方雄任軍統「香港區」秘書。〈國民政府文官處人事調查表〉國史館檔案 侍從室檔案 檔號 1000037795。

¹⁷ 姜豪，〈我向日方探和經過〉，收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總第33輯，頁123-126。

¹⁸ 今井武夫著，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今井武夫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8月第一版），頁168。

無所作為，故仍思取巧謀和，高山所談和平辦法，據謂撤兵無問題，程序與時間，視吾實行親日反共之程度為比例。所要求事，除反共經濟合作外，最重要在委座退隱，同時對汪逆須予面子，至於滿洲問題則不談，職告以中國在求本身之獨立生存，為此而戰、為此而和，目前環境益佳，無須求和，但為謀二國之真誠，永久親善合作，覺日本若能放棄侵略，當為言和，其原則在不損傷領土主權之完整，至於委座係全國信仰權威之所集，退隱根本不能談，至於汪逆為全國人士無法寬容，故上述見解完全錯誤，彼繼謂此情亦所深悉，但為面子覺不得不如此，惟尚可商量，若委座退隱改為短期休養，汪逆問題亦可設法，職告以停戰撤兵之後，個人問題再行考慮，最重要事，在談判期間不能成立偽中央，否則即無誠意，談判無法進行，彼乃允設法阻止，最後約定，待雙方請示後，再行約期續談¹⁹。

由該電文可窺知中日雙方此次會談的真正意圖，他們都有謀略的考慮，不是單純的僅是要罷兵言和。渝方是想藉和談阻止汪政府之成立，日方則要求蔣中正要下野，雙方開出的條件其實都是對方難以接受的，於是姜豪及高山(應為吉田東祐)只得再向其高層請示。姜豪之電文最後提到對日方之觀察，認為日本內部意見不一，應繼續虛與委蛇，以動搖其內部，並吸收汪係以外之漢奸使與汪對立，若能藉與日方和談機會徹底處決汪精衛為最佳²⁰。

姜豪與鈴木及吉田之會談都透過劉方雄及吳鐵城電告戴笠及朱家驊。戴笠一直無進一步指示，但十一月二十五日姜豪接到朱家驊一電要其儘速返渝²¹。二十九日姜豪回電稱遵命準備返渝，但擔心戴笠方面是否尚有其他任務，同時姜又提到今井要求若重慶真的想談應該派出要員至香港，今井亦將赴港一談，但今井希望姜豪能先至上海與其一晤²²。然而十二月二日朱家驊再電姜豪稱奉總裁指示和談不得繼續進行並速返渝²³。然而姜豪似乎捨不得放棄，十二月五日姜之回電稱坂垣已加派人員會同吉田將於七日至港，姜欲先與晤談後再行赴渝，姜再提因戴笠一直未來電，故擔心戴笠之態度²⁴。隔日，姜再電朱家驊解釋因為七日日人將由上海至香港與其會談，為顧全擔任其與日人聯絡之楊鵬博與朱耀泰之安全，不

¹⁹ 〈姜豪香港電朱家驊—民國 28 年 11 月 14 日發電〉《朱家驊檔案》。姜於該電稱與其會談者名為「高山」，核對姜豪之回憶文章，「高山」應為吉田東祐之化名。

²⁰ 〈姜豪香港電朱家驊—民國 28 年 11 月 14 日發電〉《朱家驊檔案》。

²¹ 〈朱家驊電姜豪—民國 28 年 11 月 25 日〉《朱家驊檔案》。

²² 〈姜豪香港電朱家驊—民國 28 年 11 月 29 日發電〉《朱家驊檔案》。姜豪曾在其回憶文章駁斥今井回憶錄中有關今井曾要求其至上海一談為虛構，今以檔案證實今井說法為真。

²³ 〈朱家驊電姜豪—民國 28 年 12 月 2 日發電〉《朱家驊檔案》。

²⁴ 〈姜豪香港電朱家驊—民國 28 年 12 月 5 日發電〉《朱家驊檔案》。

得不再與日人一晤，待朱楊二人料理好家務出走後即絕往來，姜再引戴笠為藉口稱待將情形報告戴笠得其核准結束其他事務即赴渝。最後姜豪自評其此次藉和談阻止汪精衛組織政府之工作尚見成效，但以仍未達最後目的為憾²⁵。於是日方所謂「姜豪路線」在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以蔣中正之反對而結束²⁶。姜豪於朱家驊催電兩三天後即回到重慶結束此次工作²⁷。按蔣中正之所以反對，應該是得到姜豪與吉田會談內容中顯示日方不僅不願放棄汪精衛，且竟要其下台，既然達不到阻止汪政府之成立，日方又作此無理要求，則此種和談就重慶而言已失去意義。

但是姜豪雖然結束其與日方在香港的工作且回到重慶，而早在姜豪離開上海後，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委吳紹澍及在上海主持國民黨地下工作的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卻聯繫上姜豪的舊關係朱泰耀，朱轉向二吳提供所謂「日偽」情報²⁸。吳開先還派出一位女情報員鄭蘋如打入「小野寺機關」，鄭蘋如告訴小野寺，重慶要與日方和談，但會妨礙和談的是汪精衛，倘若汪的所謂新中央政府建立以後，日華和平就沒有希望了，鄭還詭稱戴笠已來到上海，希望小野寺能與戴笠直接商談，不久小野寺終於與「戴笠」會面，這位「戴笠」出示蔣中正的委任狀稱要達到和平除與蔣中正談之外，擁立汪精衛是沒有用的，小野寺深受鼓舞並回報東京，但不久汪精衛的特工首領李士群即查明小野寺所見之「戴笠」是吳開先等派人冒充，於是小野寺黯然回到東京，失去「小野寺機關」保護的國民黨地下工作人員遭到李士群的大搜捕²⁹。然而軍統利用和談阻止汪政府成立並不僅止於此，早在姜豪與日人在香港會談之前，軍統「香港區」的劉方雄、杜石珊、曾政忠及運用人員張治平等人也正與日人進行著類似的「謀略戰」。該次和談於姜豪工作中止後仍繼續進行著，其目的主要也是爲了要破壞汪精衛政府的成立。

三、阻滯汪府、香港會談

早在民國二十七年七月，日人萱野長知即到香港活動中日和平，戴笠經過蔣中正之同意後派軍統「香港區」人員與之周旋，但戴笠之目的是要採取敵國對戰和的真實態度，是採情報立場，要深入搜取敵情³⁰。就在萱野來到香港的同時，

²⁵ 〈姜豪香港電朱家驊—民國 28 年 12 月 6 日發電〉《朱家驊檔案》。

²⁶ 〈朱家驊致戴笠函〉《朱家驊檔案》姜豪在其回憶文稱其工作因朱家驊與戴笠爭權而中止，但事實上朱家驊於此函件中曾向戴笠解釋是總裁的指示。

²⁷ 姜豪，〈我向日方探和經過〉，收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 8 月），總第 33 輯，頁 126。若參考檔案則姜豪說法較接近事實，而今井回憶錄中稱姜豪於一月曾再會見鈴木恐怕是記錯了時間。

²⁸ 沈飛德，〈一次流產的秘密和談—姜豪先生談姜豪路線始末〉，《檔案與史學》，1995 年，第 2 期，頁 66。

²⁹ 晴氣慶胤，《上海テロ工作七十六號》，（東京：每日新聞社，昭和 55 年），頁 145~148。

³⁰ 戴笠曾由香港致電向蔣中正報告：「關於萱野長知自去年七月來港活動中日和平經過，前已迭

戴笠調派劉方雄擔任「香港區」書記，十月劉方雄羅致廣東台山籍之曾政忠，曾原為華裔美僑，畢業於加州大學，曾追隨李濟琛，劉認為曾政忠熟諳英語，可與英美駐港情報人員交換情報，民國二十八年初，曾政忠又介紹粵東人杜石珊參加工作，杜為留日之士官學校學生，日文造詣深，且與當時在華日軍將領多為士官學校同學，常有書翰往來，對日軍在華序列及其移動，多有所知，於是在劉方雄及香港區三位前後區長郭壽華、李崇詩、王新衡的協助下展開了與日方的和談。

民國二十八年春杜石珊向戴笠回報稱目前日本陸海軍部及外務省，甚至在野黨派，均堅決反對擴大對華戰爭，力主積極謀和³¹。三月十七日軍統香港區再電報戴笠關於杜石珊與萱野長知的談話內容，萱野稱其回到日本時訪問朝野要人，多對中日事變表惋惜，頭山滿且有來華謁蔣委員長之意³²，萱野又說中日兩國應同時發表和平停戰宣言，兩國政府互派大員會議於約定地點，議明逐步退兵接防之地點³³。四月戴笠親赴香港指導軍統人員、面授機宜，戴笠轉述蔣中正的指示稱日本早晚將南進掠取資源，是時將與英美為敵，情勢於中國有利，最後勝利必屬中國，故此時與日本絕無和平可言，即使運行謀略，亦須絕對保密，免致影響與英、美、俄之關係。戴笠再對劉方雄等人說：

你們須以熱衷和平姿態為餌，以遂行吾人之謀略。首要之圖，為阻滯汪偽組織，不使於短期內成立，蓋汪偽如迅即登台，國內不穩份子，將如蟻之附腥，聲勢浩大，立即形成國家分裂之局面 阻滯越久，則汪逆身價越降，日本益越加藐視，並予以策反分化之時機 故你與萱野晤談之初，必須斬釘截鐵，堅決要求其對汪偽之阻滯，作一確切之保證，否則雙方洽談將立告中斷³⁴。

戴笠的指示說明了重慶願與萱野會談之真正目的。四月戴笠在香港時曾向蔣中正回報香港區與日人的會談情形，戴笠再一次重申派杜石珊與日方和談是假

經呈報在卷，生處為採取敵國對戰和之真實態度，故商討假裝參與活動之反間杜石珊不斷與之聯絡，蓋在情報立場，盡我深入搜取之義。」〈戴笠香港電侍從室—民國 28 年 4 月 4 日〉國史館檔案 蔣中正總統文物 08A-229 特交檔案 中日戰爭 檔號 080103 第 028 卷。以下所引檔案皆為國史館特交檔案，故不再贅述僅列檔號。

³¹ 劉方雄口述，裴可權筆錄，〈抗日戰爭中軍統局謀略戰一例〉，《傳記文學》，第 39 卷第 2 期，民國 70 年 8 月號，頁 97。

³² 頭山滿為日本浪人組織「玄洋社」及「黑龍會」領袖，與犬養毅(犬養健之父)、萱野長知等都是國文孫中山及蔣中正之舊友。鈕先銘，〈日本的布衣王侯：頭山滿〉，《中外雜誌》，第 11 卷第 5 期，民國 61 年 5 月號，頁 22~30。

³³ 〈戴笠呈侍從室—民國 28 年 3 月 20 日〉檔號 080103 第 028 卷。

³⁴ 劉方雄口述，裴可權筆錄，〈抗日戰爭中軍統局謀略戰一例〉，《傳記文學》，第 39 卷第 2 期，民國 70 年 8 月號，頁 98。

的，乃爲了「反間」，三月萱野長知將日華會談情形報知東京後，日方求和迫切，再派出貴族院議員小川平吉於三月中旬至香港，擬做進一步活動，小川透過萱野轉給杜石珊親筆書一通。戴笠請示蔣中正是否可派小川認識的人與之晤談，藉以刺探日方對和平之真實態度³⁵。然而五月蔣中正卻命令戴笠不准杜石珊再與小川來往，但小川仍不死心，五月間小川透過杜石珊轉給蔣中正一函，小川於該函首先表達自己是同情中國的，「八國聯軍」其首倡中國保全之議，俄軍佔滿洲，亦強烈主張俄兵撤退，遂至日俄開戰，其又稱顧慮中日兩國之將來，宜速確立東亞和平之基，免受「第三國際」之禍也，中日兩國如唇齒輔車，關係密切，相持不下將如鸚蚌相爭，漁翁得利，並稱其不遠千里而來，實欲與中國有所面議，並希望蔣派人至香港會談，不然其也願挺身赴渝³⁶。然而重慶並不爲所動，蔣中正再次命令不得再與小川往來，且命令將小川來函退回，當杜石珊將函件退還時，萱野嘆息，小川則莞爾而笑稱與所料者同。香港區回報小川及萱野預定於六月離開香港，小川返東京，萱野暫留上海³⁷。

蔣中正下令不准再與小川晤談，香港區也回報小川及萱野將回東京及上海，但事實上卻不然，戴笠並未完全遵照蔣中正的指示，因爲香港區人員在五月之後還不斷與萱野會談，遂行其謀略戰。四月戴笠由香港回去重慶後，軍統人員與萱野曾在「半島」、「告羅士打」、「香港」三大酒店開始會談，研討如何阻滯汪精衛，如何互保機密等，萱野承諾汪政權之成立與否，爲洽談能否持續之關鍵所在，其將先回日本與各方協調此點，預計絕無問題，十天後將再度來港。萱野再度來港時，雙方至軍統所租之「九龍塘別墅」密談，萱野欣然相告日方同意，在洽談未絕望前，保證不讓汪政府成立，軍統且將之做成書面，請其簽名，以昭憑信，此後雙方討價還價，折衝樽俎，直至八月初，萱野宣告日方可讓步至「九一八事變以前狀態」，並表示此爲最後條件，無可再讓，戴笠指示軍統仍以保持中國領土完整，主權獨立爲原則，萱野稱其與其師頭山滿曾贊助孫中山先生之革命，深愛中國，目前條件中國反較戰前爭回不少權利，希望中國政府盡快同意。但直至民國二十九年二月重慶皆未爲所動，於是萱野知道難以談攏，準備離港赴滬，臨行前劉方雄告萱野若重慶有何轉機，將再聯絡。萱野離開前乃將其上海聯絡地址抄交曾政忠，於是劉方雄、曾政忠、杜石珊等人以破壞汪精衛組織政府爲目標的對

³⁵ 〈戴笠香港電侍從室—民國 28 年 4 月 4 日發〉檔號 080103 第 028 卷。

³⁶ 〈戴笠呈侍從室—民國 28 年 5 月 22 日〉檔號 080103 第 028 卷。

³⁷ 〈戴笠呈侍從室—民國 28 年 5 月 31 日〉檔號 080103 第 028 卷。

日和談宣告結束³⁸。

劉方雄等香港區人員結束與萱野的接觸後，民國二十八年末至民國二十九年，透過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的介紹，再與日本駐香港領事館武官鈴木卓爾、「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今井武夫及大本營第八課長白井茂樹展開和平談判。在這次的談判中歷來皆引日人《今井武夫回憶錄》一書為據，稱有所謂「宋子良工作」，例如日本學者藤井志津枝的《日本對華諜報工作－誘和》，其中有一章探討「桐工作」即所謂「宋子良工作」，該書引用大量日文資料，對該會談之前因後果敘述頗詳³⁹。有關該次會談一直以來僅被史家定義為中日雙方的秘密和談，然近年來由於《國史館檔案》的解密，新的證據顯示並不如此簡單，日方的說法不一定正確，大陸學者楊奎松，台灣學者許育銘等人，都曾對這個日人所謂的「宋子良工作」的香港會談有新的研究成果，他們都引《國史館檔案》證實了這是一次雙方的「謀略戰」或「情報戰」，楊奎松之文拋開大陸固有之意識形態，跳脫出大陸方面一貫認為「宋子良工作」是蔣介石政府的「投降主義」，而重新認識到蔣堅定的抗日意志。許育銘之文則引用大量日文檔案與中文檔案比對，從中尋求最正確之史實，本文將在前述二文之基礎再做進一步發揮，但是在拾二人牙慧之餘，本文再運用了二文未提到的原「軍統」香港區人員劉方雄之口述文章，這份資料頗為重要，尤其它將為誰假冒宋子良提供重要線索。因為在劉方雄這份回憶文章中，劉堅稱所有「軍統」在港與日人之會談皆曾參與，劉文對於戴笠有否派員冒充宋子良一事態度曖昧，僅稱要予澄清⁴⁰，並未正面否認該事。

下文將在前述二文基礎下，再核對今井、劉方雄之回憶文章及國史館檔案三份資料，將「軍統」主導的這次和談謀略作一簡單敘述，但本文重點仍僅落在本論文主題，亦即僅著重於中日雙方在有關汪精衛政府成立之攻防，然而本文另有一意外收穫，即推測出今井言之鑿鑿的「宋子良」的身份。不管人們對該會談如何定義？參加者又是誰？宋子良又是否參與其中，但該談判確確實實曾發生而且主要目的也是為了讓日本取消已經成立的汪精衛政府，阻止日本對汪政府的承認，甚且由資料研判日方也以該和談為謀略，故意洩露和談消息，打擊重慶之威

³⁸ 劉方雄口述，裴可權筆錄，〈抗日戰爭中軍統局謀略戰一例〉，《傳記文學》，第 39 卷第 2 期，民國 70 年 8 月，頁 98。

³⁹ 藤井志津枝，《誘和－日本對華諜報工作》，（台北：文英出版社，1997 年 11 月），頁 196。

⁴⁰ 劉方雄口述，裴可權筆錄，〈抗日戰爭中軍統局謀略戰一例〉，《傳記文學》，第 39 卷第 2 期，民國 70 年 8 月，頁 97。劉於二十七年七月由軍統「香港區」助理書記升任副區長，三十年香港淪陷後再升任區長，劉謂與日方謀和之事，但凡涉及戴先生者，無一不終始其事，對於派員冒充宋子良一事，實則有傷戴先生之令譽，似有義務予以澄清。該文發表於民國七十年八月。

信。

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鈴木卓爾繼任為香港領事館武官，當時「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擬與重慶和談，乃派鈴木主其事，鈴木與當時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有舊，鈴木造訪張治平並希望覓取重慶和談路徑，於是張治平找到軍統人員曾政忠，曾政忠再介紹另一軍統人員盧沛霖予張。於是三人在香港「金城酒家」密商，會後盧沛霖電重慶請示，重慶指示允許張、曾、盧等於特工與情報範圍內與日人周旋⁴¹，張治平乃成為「軍統」運用人員，二月張治平通知鈴木一談，日方再派出今井武夫及臼井茂樹至香港負責，二月八日張治平偕曾政忠與今井及臼井見面，由於張與今井為舊識，即為今井及臼井介紹曾政忠，隨後日方向張、曾等提出「八項覺書」⁴²，盧沛霖(或即為劉方雄)將該覺書內容電重慶，二月十七日，重慶將張治平召回，張至重慶後詳呈談判經過，戴笠訓斥該覺書荒謬，對於其中所談「偽滿問題」、內蒙駐兵問題及「汪精衛問題」，認為是日人妄想，戴並要張向日人說欲談和平，須先撤銷「汪偽組織」，張回香港後乃將重慶意思轉達鈴木，鈴木遂再赴東京及南京請示日方意見，三月中旬，重慶再召回張治平有所指示⁴³。蔣中正下令：「如敵方不能先行解決汪逆，則張治平不能再與鈴木輩有任何接洽」⁴⁴，大約是三月間汪精衛政府就要成立，重慶憂心如焚，蔣乃下此最後通牒，利用該和談急於阻止⁴⁵，然三月三十日汪政府仍然成立了。

五月初日人再要與張會談，張秉持重慶意見以日人無誠意不與談，五月四日鈴木派秘書增田迭相求見，增田提出和平意見五項，其中有「日本對汪政權，擬於一、二個月內不予承認，預為中日和平之最後時機」，可能因為取消汪政權燃起一線生機，於是張再得重慶允許與鈴木會談，但張治平秉重慶之命，仍以撤銷汪偽組織為條件，於是鈴木與今井、臼井再與張治平及曾政忠等人於澳門會談，為取得重慶信任，鈴木出示由「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總參謀坂垣征四郎擬就之「撤銷汪精衛保證書」底稿，張治平抄錄之並交給曾政忠，曾將之攜至重慶，該

⁴¹ 〈張治平呈戴笠—民國 29 年 9 月 8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當時張因與日談判事情曝光，損害重慶聲譽，被重慶疑為反間，遂被戴笠召回重慶，該資料為其辯白書。劉方雄回憶文中提及，曾政忠介紹張治平予自己而非盧沛霖，全文亦無盧沛霖其人，疑即為劉方雄。

⁴² 〈張治平呈戴笠—民國 29 年 9 月 8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而今井回憶錄中稱二月張所介紹之人名為「宋子良」，若核對國史館檔案，則宋極可能是曾所偽裝。

⁴³ 〈張治平呈戴笠—民國 29 年 9 月 8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

⁴⁴ 〈戴笠呈蔣中正—民國 29 年 8 月 12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該內容為戴笠調查張治平事件時引述蔣之談話。

⁴⁵ 民國 29 年 3 月 30 日汪精衛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見蔡德金、李惠賢編，《汪精衛偽國民政府紀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年 7 月第一版)，頁 54。

保證書中有「對於汪問題基於內政不干涉之原則處置」之語⁴⁶，坂垣這樣的保證仍不能使重慶滿意，因其仍不肯遽然放棄汪，於是戴笠再電張治平指示，如日方不先除汪，中央斷難與之言和，並斥張今後不可與鈴木等涉及中日和平問題。然而張並不完全遵守重慶之訓令，六月三日張治平與曾政忠再與鈴木、今井及白井於澳門會談⁴⁷。鈴木透露坂垣稱若中方有和平誠意，則去汪而後言和亦未嘗不可，但若於日方佔領區進行去汪，則於日本道義有礙，日本亦將起革命矣，因此坂垣提出指定適當地點如長沙或重慶，坂垣當偕同汪精衛前來，將汪交給重慶請和，或者在中立地點如香港、南洋等地會見亦可，關於承認滿洲國及防共駐兵等暫可不提。七月一日鈴木再見張，告以坂垣將再與中國訂一如同「英日同盟」般的軍事同盟，提出諸多平等措施。「軍統」香港區人員再將該訊息轉報戴笠，戴笠覆電稱：「敵方明知汪逆無用，而仍不肯犧牲之，甚至謂將由坂垣偕汪逆來見委座當面言和等情，是證敵方之無言和誠意，同志以站在採取情報之立場與德國通訊社記者之身份，可與鈴木見面，但對中日和平之問題，萬不可有任何意見之表示」⁴⁸，由於日方遲不取消汪政權，蔣中正早已透過戴笠下令張治平不得再與鈴木談中日和平，但此處戴笠卻不完全照作，他允許張繼以採取情報及外國人立場與日方周旋，這與之前，劉方雄等人於蔣下令不得再與萱野會談後，仍得戴笠默許繼續與萱野周旋一樣，可見戴笠指揮的與日方的和談其方法及策略不見得樣樣報蔣知道。

四、謠言四起、渝方查辦

七月二十六日張治平又電稱據鈴木轉告，天皇已命令坂垣赴長沙向蔣求和，坂垣帶汪精衛同赴長沙意在將汪交重慶處置，並非帶其前往參加和平談判，坂垣與蔣中正會談後，汪政權由中國自行處置，然而同時戴笠又接到「軍統」南京區情報，南京已盛傳日方與重慶進行全面和談，周佛海並稱願隨汪赴長沙。這樣的消息令戴笠警覺到日本也在玩把戲，日方將和談大肆宣傳，以圖動搖重慶的抗戰決心及陣容，面對外界傳說蔣即將與坂垣及汪精衛於長沙會談一事，於此戴笠才向蔣說明曾繼續要港區與日方接洽，並請求蔣作進一步指示⁴⁹。

八月二十八日鈴木由東京及南京返回香港，鈴木告訴張治平等人其此次無論

⁴⁶ 〈戴笠呈蔣中正—民國 29 年 9 月 15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

⁴⁷ 〈張治平函鈴木卓爾—民國 29 年 9 月 15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今井武夫回憶錄中亦提到六月三日曾與最高國防會議秘書主任陳超霖、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章友三及宋子良於澳門會談，由張治平接送日人至中方指定地點，三人出示蔣中正之委任狀。見該書，頁 148。

⁴⁸ 〈戴笠呈蔣中正—民國 29 年 9 月 12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

⁴⁹ 〈戴笠呈蔣中正—民國 29 年 9 月 12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

在南京、東京均極力要求先毀汪組織，再與中國議和，然日政府以迄未能與中國代表正式晤談，毀汪之後向何人交賬為慮，於是日政府請鈴木攜來坂垣親筆保證書及近衛致蔣中正之親筆函，鈴木轉述近衛首相稱其前此不以國府為對手之宣言失去有效性，先前五月，鈴木之「坂垣親筆保證書」就曾先以底稿出示張治平，當時張治平曾抄其保證「汪問題」日方不干涉內容交曾政忠攜回重慶。此時鈴木稱此二份正式文件為對中國最高當局誠意之表示，再談及汪問題，鈴木稱汪為日本政略之工具，可有可無，惟中日如無和平可覓，亦只有暫時利用之耳，故九月為中日和談之重要時期⁵⁰。然而鈴木當時雖攜帶二份文件但並未出示其內容，張治平曾就此請示重慶，重慶稱希望張索閱內容後再決定是否攜來重慶，然鈴木一直不肯出示兩份文件內容，僅表示適當時機才能交張⁵¹，但是九月外界將重慶派「宋子良」與日方會談的事傳得沸沸揚揚，蔣中正接到一份情報甚至稱有人在香港持蔣之委任狀與日方談和，該有蔣簽名之委任狀還令日方攝印帶回，蔣中正懷疑張治平除有偽造蔣親筆文件之嫌外並認其有「反間」嫌疑。於是九月七日在蔣中正命令下，戴笠召回張治平並將之軟禁，戴笠又派「軍統」第三處處長徐業道訊問張⁵²。張治平之所以被蔣懷疑為反間不無原因，一來何以其和談盡皆曝光，而參加和談者竟還有所謂宋子良、章友三、陳超霖等三人，且外界及汪政府都傳說蔣將與坂垣及汪精衛會晤，然而事實上蔣根本一直未曾理睬日方相關提議，再者竟有人敢偽造蔣之親筆。

九月之期已屆，日方履行承諾，於是曾政忠終於由鈴木處抄到坂垣有關取消汪精衛之保證書，張治平乃將之攜回重慶，然令重慶吃驚的是，這份「坂垣保證書」(正式文件)其內容竟與當初五月時張治平所抄「坂垣保證書底稿」不同，五月底稿稱日方不干涉的是「汪問題」，然而九月張攜回的正式文件卻是日方不干涉「蔣、汪合作」⁵³，這暴露了日方某些陰謀，若五月重慶中計以為「坂垣保證書底稿」是真的，亦即以爲坂垣將帶汪精衛赴長沙，並將汪交給重慶處置而答應由蔣赴約，那日方將拿出九月的正式文件證明他們僅答應汪同赴長沙是談「蔣汪合作」，即他們從未答應放棄汪精衛。對於以上諸多疑點都是重慶懷疑張治平替

⁵⁰〈戴笠據葉遇霖電呈蔣中正—民國 29 年 9 月 4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按張治平稱其電皆由港區盧沛霖轉戴笠，但戴笠呈蔣之電皆稱名為葉遇霖者所轉，故盧沛霖、葉遇霖可能皆為劉方雄之化名。

⁵¹〈戴笠關於張治平與鈴木洽談和平一事呈蔣中正—民國 29 年 9 月 15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

⁵²〈戴笠關於張治平有反間重大嫌疑一案呈蔣中正—民國 29 年 9 月 7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

⁵³〈戴笠關於張治平有反間重大嫌疑一案呈蔣中正—民國 29 年 9 月 7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

日方縱反問之因，然而張對以上諸點卻一一提出理由反駁，且稱若有偽造委座親筆，「一經查出，願受極刑」⁵⁴。

由日方所謂「坂垣保證書」前後內容不同可推知，日方可能亦非真欲和平，他們亦有謀略考慮，觀日方將與重慶和談一事之假消息洩露於汪政府亦可知，周佛海曾於其民國二十九年六月七日日記寫道：「據云今井於第二次赴港後，此次又與白井赴港，對方仍為宋子良等三人，並云有使重慶派代表來滬與吾輩接洽之可能，告以余所得消息，則完全相反，其中必有謀略，未可樂觀。」⁵⁵周佛海已點出重慶不是真要和平，日本為何還要繼續？周佛海六月二十二日日記又稱：「影佐及今井來，談重慶方面望汪、蔣及坂原三人晤商談和平問題，地點望在長沙。」⁵⁶，長沙會談是日方提出來而絕非重慶主動，重慶根本亦未答應，蔣五月已令不准張治平再與鈴木談判，如此今井又怎會說出重慶主動要求會見長沙？是否故意放假消息？七月八日日記又載：「堀場密告坂原與蔣會於長沙一事，刻正候蔣之親筆簽覺書 大約一週後必有消息。並謂重慶可派蔣之親信而為日本所同意之大員至漢口接坂原赴湘，堀場詢余要何人來接最佳，余主吳忠信。」⁵⁷今井把長沙會談說得這樣篤定，似乎一週後就將談成，這樣完全昧於事實。

然而會不會是張治平及「軍統」香港區偽造重慶同意書使日方誤信呢？這是不大可能的，因為檔案顯示六月二十六日及七月二十六日張治平曾兩度轉來坂垣希望重慶考慮「長沙會談」之建議⁵⁸。而鈴木且於五月及八月兩度攜來坂垣關於不干涉汪問題之保證書，以希望得到重慶的同意。這樣五月至八月間日方是完全知道重慶對「長沙會談」沒有反應的！七月二十六日影佐竟向周佛海出示其於「香港會談」所抄蔣中正之覺書，其中載明「長沙會談」之地點、日期、方法等，且有重慶軍委會的關防，周佛海看了之後覺得蔣中正之署名筆跡不像，且偷攝來請周鑑定之宋子良照片亦不像宋子良本人⁵⁹。這個蔣中正之覺書若非張治平等軍統人員所假造，就是日方所杜撰，但即使是日方被軍統所欺，周佛海的懷疑加上日方的調查，他們根本是知道宋子良為假，那為何還要繼續與重慶和談？今井說是

⁵⁴ 〈戴笠關於張治平與鈴木洽談和平一事呈蔣中正—民國 29 年 9 月 15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

⁵⁵ 蔡德金編著，《周佛海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 317。

⁵⁶ 蔡德金編著，《周佛海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 324。

⁵⁷ 蔡德金編著，《周佛海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 339。

⁵⁸ 〈戴笠關於張治平報告敵方企圖與我言和一事呈報蔣中正—民國 29 年 8 月 12 日〉檔號 080103 第 028 卷。

⁵⁹ 蔡德金編著，《周佛海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 344。

不放棄與重慶溝通的管道⁶⁰，但恐怕雙方根本是諜對諜⁶¹，日方刻意將和談消息洩露，以打擊重慶之威信，此舉確也造成重慶之緊張及蔣之震怒。

五、「子良」身份、呼之欲出

再者究竟有無所謂「宋子良」參加會談？民國二十九年九月蔣中正因向戴笠追問張治平之招搖撞騙行為⁶²，戴笠將張召回重慶軟禁後再將劉方雄與曾政忠召回，詢問宋子良是否為張所串演，劉向戴笠說：「甚有可能，但無實據，且與本局絕無關係。縱認確係張之所為，則張之功過，似乎可相抵銷，且事過境遷，已無法深究，亦無足深究。」劉的話頗耐人尋味，似乎不否認有串演「宋子良」之事⁶³，劉方雄在這篇民國七十年的回憶文章又提到，在其與萱野長知進行「和談謀略」期間，曾政忠曾介紹張治平與其晤面，後張治平再介紹今井武夫與臼井茂樹、鈴木卓爾與劉、曾會談，劉首先以延滯汪偽組織為請，今井答應洽談期間，絕不容許汪政權之成立，因當時正值第一次長沙會戰，劉方雄與曾政忠曾要求日方以暫停新墻河進攻為和談誠意之展現，最後竟獲日軍同意及實現，為此使日軍於第一次長沙會戰大敗。劉稱該次和談最後因為張治平被召回重慶而停止工作⁶⁴。劉又稱「軍統」與日方在香港的會談他都有參加，故由劉方雄之記述可知，日人所稱的「桐工作」或「宋子良工作」，重慶的參加者至少有劉方雄、曾政忠、張治平，劉文又指出軍統「香港區」前後任區長王新衡、李崇詩、郭壽華等人曾加以指導，故前述三人為主要參加者，後三人應是協助及指揮者，當然背後有戴笠的同意及遙控，若核對檔案，則劉方雄極可能是檔案中的盧沛霖或葉遇霖。

但劉文竟稱其與今井、臼井及鈴木等人之會談是在民國二十八年八月，這與檔案有年代之出入，檔案中顯示該次會談應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以後直到九月，劉所記會不會是另一場會談？答案是劉文可能記憶有誤或故意說錯時間，因為檔案中張治平稱其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以後才歸附重慶，成為軍統香港區運用人

⁶⁰ 今井稱日方當時懷疑該「宋子良」為軍統「香港區」區長王新衡。今井武夫著，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今井武夫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8月第一版)，頁146。

⁶¹ 〈張熾章呈陳布雷—民國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張為重慶派在香港人員，其提供的情報稱有關宋子良和日方會談蔣與坂垣會談長沙之事，確定為鈴木所捏造，坂垣等人繼續不斷造謠，圖續控制日本軍權，破壞重慶聲望，支持汪政權。檔號080103第030卷。

⁶² 唐縱，《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87年3月出版)，頁136

⁶³ 劉方雄口述，裴可權筆錄，〈抗日戰爭中軍統局謀略戰一例〉，《傳記文學》，第39卷第2期，民國70年8月，頁101。

⁶⁴ 劉文若核對檔案則所述日期有問題，劉稱其偕曾透過張與今井會面為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但檔案及今井回憶錄都說是在民國二十九年一、二月間，且「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成立於民國二十八年九月，鈴木於十一月才被其任命為駐香港武官，八月間是不可能與劉會談的，劉所記與萱野談判之時間與檔案極吻合，但與今井等人之談判則提早半年，是否為否認「宋子良」之說而有意誤導？

員，「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是在民國二十八年九月才於南京成立⁶⁵，今井之回憶錄稱鈴木於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才被「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任為香港領事館武官，且今井民國二十九年二月才第一次見到「宋子良」，才開始與重慶進行「桐工作」，可見劉文時間有誤，劉文稱其與曾政忠於二十九年夏天被召回重慶詢問「宋子良」之事，但檔案顯示應是九月，即是秋天。

再者張治平在民國二十九年九月被召回重慶軟禁後，九月七日其自白堅決否認有如外傳宋子良、章友三及陳超霖參加會談，稱只有他與曾政忠兩人，張稱日方都認識他，他不可能假冒宋子良，而章友三可能是曾政忠被日人譯錯之名字，因「曾」、「章」二字音近⁶⁶，然而九月十五日張竟改口稱有讓曾政忠化名章友三之事，但仍堅持無宋子良及陳超霖⁶⁷。由張治平反覆之供詞可知他必隱瞞了某些事情，且至少劉方雄也曾參加該會談而張竟堅稱只有他與曾政忠？然而果真無「宋子良」嗎？張治平雖堅決否認但卻曾說：「敵人等對之雖有對象之錯誤感覺，職等未有加以矯正，此所以不令其對我有懷疑，致使工作發生阻礙」⁶⁸，這樣的話表明了如果日方誤認他們為誰，他們也不會否認。曾政忠被戴笠召回重慶後，被與張治平隔離訊問，曾肯定張於二十九年二月投效中央後，工作熱心，對張是否偽造文件，冒充人員，曾稱「毫無所聞」⁶⁹。曾的話與張根本產生矛盾，因為張最後是承認曾政忠冒充章友三，所以兩人勢必還隱瞞一些事。

其實萱野與今井於工作失敗結束後都曾與劉方雄約定日後派曾政忠至上海擔任雙方聯絡員，按劉方雄回憶文章的說法，民國二十九年冬劉方雄派曾政忠赴上海，加入軍統「滬二區」，民國三十三年夏天曾政忠被日滬西憲兵隊逮捕，後來被今井武夫所保釋，因當時今井為「中國派遣軍副總參謀」正急於覓路線與重慶和談，今井遂撥一住宅及電台予曾政忠與重慶聯絡之用⁷⁰。無獨有偶的在今井的回憶錄中亦曾記錄這件事，但今井稱被捕的人名字是曾廣，今井進一步指出這位曾廣就是當年與他們進行香港會談的「宋子良」，今井詢問這位曾廣是否還有當年的熱情為中日和平而努力？曾廣答稱考慮成熟後再提出計劃⁷¹。對照劉方雄

⁶⁵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台北:綜合月刊社，民國 63 年 2 月)，頁 573。

⁶⁶ 〈徐業道與張治平談話呈戴笠—民國 29 年 9 月 7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

⁶⁷ 〈戴笠呈蔣中正—民國 29 年 9 月 15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

⁶⁸ 〈張治平補充徐業道晤談內容呈戴笠—民國 29 年 9 月 7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

⁶⁹ 〈戴笠呈蔣中正—民國 29 年 9 月 15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

⁷⁰ 劉方雄口述，裴可權筆錄，〈抗日戰爭中軍統局謀略戰一例〉，《傳記文學》，第 39 卷第 2 期，民國 70 年 8 月，頁 101。

⁷¹ 對於曾政忠被今井所救之事，今井之回憶錄亦提及，但主角名「曾廣」，然而由於情節與時間同劉文所述極相似，故應是同一事件，「曾廣」極可能是當年張治平及劉方雄口中的「曾政忠」，然而今井卻指出他就是參與會談的「宋子良」。今井武夫著，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今井

與今井的說法，則曾廣不是曾政忠又會是誰？劉方雄文章又提到戰爭末期，透過曾政忠，劉方雄一直與今井有聯繫，日本投降時，戴笠曾要劉方雄與曾政忠告訴今井，請今井轉告岡村寧次不要讓共軍進入京滬杭地區，否則重慶將視其為頭號戰犯⁷²，今井也在其回憶錄中提到：「八月十五日戰爭結束，曾廣以戰勝軍的幹部恢復了自由，而我則因戰敗關係，被剝奪了自由，拘留在南京，這時他曾一度特意從上海來訪問我。」這兩段記述又有吻合，所以可以肯定曾廣即是曾政忠。大陸變色後，民國四十四年曾政忠(曾廣)在香港為台灣做情報，曾經寄一封信予今井，曾政忠(曾廣)感謝當年在上海今井解救他，且對於自己曾冒充「宋子良」一事感到抱歉⁷³，再者有關「宋子良」即曾政忠(曾廣)的說法還有一個證據，因為今井當年見到的「宋子良」是「英語說的很好，時常把雪茄煙拿在手裡」⁷⁴，對照劉方雄所描述的曾政忠：「擅英語，僑居美國三藩市」⁷⁵確有相似之處，宋子良是受美國教育的，找一個擅英語的美國華僑曾政忠來假扮他是很適合的。歸納今井及劉方雄的說法，那也許可以這樣推測，當年曾政忠冒充「宋子良」，劉方雄可能是章友三或陳超霖，而張治平應不致假冒別人，因為他跟今井是舊識。

雖然劉方雄的回憶文章把自己參加該會談情形寫得煞有介事，但其實「劉方雄」這個名字並未出現在檔案中，然檔案中卻有一位重要人物即盧沛霖(葉遇霖)，這位仁兄負責「香港區」與戴笠的電報聯繫，而劉方雄之回憶文章亦不時顯示其打電報向戴笠彙報的角色，故盧沛霖是否即為劉方雄呢？而章友三、陳超霖又會是誰？只能留待更多證據來解開這個謎團。話說回來，如果「軍統」人員真的假冒這些人，戴笠絕不可能不知道，蔣早就要「軍統」別再與萱野及今井等人會談，但戴笠都未完全遵守，仍讓其「香港區」人員繼續以不同身份與日人周旋，所以等到消息外洩，影響重慶及蔣之聲譽，蔣才會為此事震怒要戴笠調查，戴笠對蔣的報告顯示其不知冒充之事應該是戴笠有所保留。

「軍統」所主導的這兩次和談，是否有達到延緩或阻止汪政權之成立呢？其實日方之所以急於進行他們所謂的「桐工作」，是在已掌握汪精衛後，試圖再使重慶屈服，以便最終進行「蔣、汪合作」，民國二十九年三月間，今井、白井、

武夫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8月第一版)，頁162。

⁷² 喬家才，《浩然集(1)》，(台北:中外圖書出版社，民國70年10月初版)，頁462-464。

⁷³ 今井武夫著，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今井武夫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8月第一版)，頁163。

⁷⁴ 今井武夫著，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今井武夫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8月第一版)，頁129。

⁷⁵ 劉方雄口述，裴可權筆錄，〈抗日戰爭中軍統局謀略戰一例〉，《傳記文學》，第39卷第2期，民國70年8月，頁97。

鈴木等與「宋子良」等人的談判已有頭緒，於是日方責令犬養健通知周佛海，中央政治會議可按預定計劃召開，但組府必須延期，犬養告訴周佛海，希望組府能延至四月十五日⁷⁶。爲此周佛海急於找影佐會談，告之利害，要求組府最遲不能超過三月三十一日，影佐表示同意⁷⁷。三月三十一日汪政府建立後，因爲日方仍與重慶在香港會談著，於是日方再推遲對汪政府的承認⁷⁸，尤其六月還傳出坂垣可望與蔣中正會面於長沙，然而十月「桐工作」宣告失敗而結束，日方才於十一月正式承認汪精衛政府⁷⁹。軍統的「和談謀略」對汪政府的建立起了延宕的作用，但根本上沒有阻止汪政府成立，日方最終還是承認了汪政府，這是因爲雙方各有謀略的考慮。

⁷⁶ 蔡德金編著，《周佛海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 267。

⁷⁷ 邵銘煌，《汪偽政權之建立及其覆亡》，（台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民國 79 年 6 月），頁 161。

⁷⁸ 周佛海 10 月 18 日日記稱日方以談判條約延遲承認，以待重慶之全面和平。蔡德金編著，《周佛海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 394。

⁷⁹ 邵銘煌，《汪偽政權之建立及其覆亡》，（台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民國 79 年 6 月），頁 172~174。